

論晉文公之從亡人士

林慶揚*

〔摘要〕

晉文公的伯業所以建立，在一定的程度上，其身邊的從亡之士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沒有這批隨亡從臣的長期調教與群策群力，晉文公是絕對無法飛上枝頭成就伯主氣候的。尤其文公流亡十九年，嘗遍人情冷暖，看盡世態炎涼，其返國嗣君的意志已消蝕大半。幸虧從亡之士的生命力挺與智謀韜略的謀動，燃起文公的鬥志，促使文公的政治生涯走向巔峰。若忽略從亡人士的動態，就無法掌握晉文公伯業的圖象。對此，從亡人士焉能不察！

關鍵詞：晉文公、從亡之士、狐偃、趙衰、胥臣

*正修科技大學文史科兼任講師

一、前言

劉文強在其〈論「被廬之蒐」〉、〈論城濮之戰〉、〈論晉國早期中軍帥〉與〈論陽處父〉¹等文，指述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的問題癥結在於這即是晉國貴族的奪權行動，並且迫使晉文公放棄軍事指揮權與一般行政管理權，進而造成日後晉國六卿專政，觀此論述理路大體不差。²本文論述的視角置放在晉文公流亡

1 劉文強師：《晉國伯業研究》（台北：學生書局，2004年），頁361-523。

2 劉師的論述網絡精密，本文的思考路向只能朝向介之推何以身隱的源由，由《左傳》的指述探究介之推在晉文公封賞行動中何以不言祿、不及祿，換言之，介之推的最後身隱有否歷史圖象的隱曲？在權力網絡的爭逐中，介之推是一種對權力爭逐場域的「道德潔癖者」（言二三子貪天功以為己力，上下相蒙）？還是不及祿的「寒心者」（祿亦弗及，未被封賞而萌生隱意）？抑是晉文公大肆賞封流亡微臣，引發整個晉室貴族不滿，在利益衝突與平衡下的犧牲者（晉文公無可奈何下的視而不見而不及祿）？甚至在後來民間傳聞由其自退不爭的節操而將之人格美化者？這些疑惑，似乎都構成了對介之推歷史圖象正確認知下的定位。有關介之推的歷史圖象與其衍生的人格圖象的分析論文，大陸學者詮釋的視景，大多是介之推東漢以後被型塑的民族忠義與道德節操的典範形象，而於《左傳》的述文鮮少連結梳理，尤其介之推讓賞隱遯緜山，晉文公求之不獲的情節被擴大渲染為一種道德廉靖之節操傳奇，進而神話色彩與神格化的匯入其人，以致失其本真。嚴謹的歷史探析與文學、社會學上的戲說傳奇，都該服膺歷史的史實，過度地想像與編織其人身隱之風采與遺德，實有害歷史之真實意義。當然，在中國社會的儒家道德期望，介子推廉靖自退，不為賞祿的德跡，隱然成為道德教化的最佳素材，此等尚隱自晦，不矜耀其功的隱君子風範，難免為社會民間大力推崇，故其退讓遠隱，求志明志的飄然身影，促使後人構摹其一鱗半爪之神采而大書其神格形象，以致有晉文公焚山逼推，推不就而抱樹明志以死，進而紀念介推忠貞節操而有寒食禁火，立廟祀之為神等民間崇拜。此介推忠貞典範之情節與形象演化圖景俱見於《呂氏春秋·介立》、《楚辭·九章》、《莊子·盜跖》、《說苑·復恩》、《新序·節士》、《韓詩外傳·十卷》、《後漢書·周舉傳》、《水經注·卷六汾水》、《異苑》……等典籍。剔除其傳奇神話與戲說的成分，其中關涉到介之推的歷史意義頗可引論，大陸學者大都忽略這其中的線索與脈絡，忽略介推言祿身隱述文中的時局脈動與其陳述意指。錢賓四先生的〈論春秋時代之人道精神下篇〉，載《新亞學報》（第二卷第二期），頁67-77之介子推條云：「《左傳》介推之讓賞，傳誦中國社會，迄今弗衰。相傳寒食禁火，即由介推而起，此與屈原投江……同能蔚為風俗，廣久人心。然據《左傳》，介推終身隱不復見，晉文公求之不獲，遂以緜封為介推之田。《呂氏春秋》亦曰：『負釜蓋簞，終身不見。』《楚辭》〈惜往日〉（按：應為〈思美人〉）乃云：『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莊子·盜跖》則曰：『介推抱木而燔死。』故《後漢書·周舉傳》乃云介推焚骸。古《琴操》（按：東漢末蔡邕）亦有介推抱木而死之語。直至近代戲劇，乃有火燒緜山（按：元狄君厚撰〈晉文公火燒介子推〉雜劇），同為中國社會所樂於稱道，故遂炫染而失其本真……蓋中國人之道德精神……臨事每易主於退讓，退讓之德即為隱……此不與人爭，不求人知，抑且終身不為人知，而其內心之所守所信，則耿然炯然，確然自信自守以至隱淪終身而不悔不悶之一段精神，亦即是一種至高之道德精神……故介之推之隱，其自身才德所至，誠以無可展布，因亦無可徵信，然終使後人想望其才德於若隱若顯中……諒介推之在當時，其終隱之志，亦已先有所為之啟召而感動其心者，故非

時與其從亡隨臣的互動，及其返國就任晉國大位的封賞從亡人士上。而在一波波的權位封賞中，晉文公如何處理與其從亡人士的權力封祿，尤其這群從亡人士的動態，考驗著晉文公的封賞與政事處理的智慧，不可不察。而引起我們思索從亡人士的封賞動態則是介之推那段賞封圖景的說文：「不言祿、不及祿，天未絕晉、非君而誰；天實真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貪天功，而上下相蒙，難與處也」以至最後隱居緜山的君臣封賞視角下的告白。它提供我們一個觀察晉文公與隨亡人士政治權力的手腕與圖象，並進而觸動日後晉國政治派系間的權力風暴，造成從亡之士與晉國公室貴族的利益衝突，引生晉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在君力

無端特起，忽然而有此終身隱淪之一想也。」錢穆論述特重儒家道德精神之涵養，他已指出中國民間社會對介推終隱與晉公求之之炫染而失其真貌，還歸介子推的歷史真實地位。又指出介推之隱因無可徵信，而使後人落入想像才德情懷之思；他最後強調介推之隱志，已先有所感召而感動其心者，此慧思乃是我們解題的最大線索。然而，錢穆先生將此隱因與儒家隱義相扣合，以孔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轉入一種儒門大隱隱德意涵的論述洞見。因此，錢穆這種洞見轉為儒家深義，對史料的梳理過於抽象朦朧，還是未能說明介之推之隱的內因外緣，從歷史的客觀角度無法提供我們信服。台灣的期刊論文有關介之推隱因的詮釋成績，大部分的視景還是關注在介之推的民間傳奇習俗與神話色彩，鮮少觸及與還原《左傳》介子推的隱因背景分析。有關論文：1、古道：〈士甘焚死不公侯——介之推及寒食節〉（《漢家雜誌》1996.3）2、鄧綏甯：〈火燒介之推——讀曲雜談之4〉（《文壇》1972.4）3、陶希聖：〈介之推與晉文公〉（《食貨月刊》1974.3）。另外，徐麗霞〈介之推與台灣介之推廟：上、中、下篇〉（《中國語文》2002.9-11）在上篇雖有觸及《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不言祿文之考證，從各家典籍考述介之推之行誼事蹟與介之推形象之歷史演變，頗佳用心。然觀徐文，云《史記》說晉文公六十二歲返國繼位之論述已謬，其文後之推證介之推形象演變的歷史意義也只是鎖定在外緣性的介推事蹟闡釋，沒有梳理清楚文公與從亡隨臣的互動脈絡及介推論說二三子以貪天功、上下相蒙之內蘊意義。換言之，晉文公與隨臣間的權力交涉分配雖是重點，然而徐文輕易地滑過與未去推敲介之推對封賞行動下的言外之意與所指，忽略對整體文公流亡圖景的脈絡勾勒，以至偏重在道德宗教的人格形象的構述，對於介推身隱的論題無法提供妥適與明確性的說明。《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晉文公：「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僖負羈氏。』」這些人從亡而無賞，積怨已久，一有機會便藉機鬧事，以發洩情緒。從亡者的心理，文公當然了解。」從亡者的形象似乎隱含三派：其一如子犯（狐偃、舅犯、咎犯）、魏犢（魏武子）、顛頡之脅逼封祿者，其一如趙衰、胥臣（司空季子）得文公心腹並能審時度勢，自我克制者，而在這兩派權勢爭逐中，不卑不亢、不企不求的當屬介子推者。然而，介子推的不言祿，未必意味晉文公不會主動封賞他，如對晉文公以行賞三次，而對自己顏色黎黑、手足胼胝盡心盡力的陶叔狐，尚且在等待失望中不忘希望，要子犯請言晉文公何以不祿之因（見《說苑·復恩篇》，在正文中，將再詳述。）！既然落在人間煙火的框架內，除非不食，否則啞巴吃黃蓮，一肚苦水含吞的忍耐程度也有限，其他從亡者看著昔日革命戰友個個飛上枝頭，回頭看自己有功無賞，情何以堪？陶叔狐者流不乏其人，而如介之推者流亦不在少數。《左傳》特書介推之論，恐怕不是一句貪天之功，上下相蒙的指責就能道盡這封賞過程中的隱曲，其中定有從亡者之隱曲的心聲傳遞！

主權性的消退與被架空之癥結背景。本文認為介子推在文公言賞歷程中多有隱曲，特別是對從亡人士的動向心態感受極深。而從《左傳》來觀照文公的隨亡人士圖象，正可釐清介之推言說的二三子貪求天功，以為己力的本衷，從而看見晉文公權力布局與人事安插的現實考量，此輩從亡人士的動見觀瞻不啻為重要關鍵。《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載：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寘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³

依介之推所言，問題的脈絡在於晉文公封賞的動向。而此動向又牽涉到流亡人士與晉文公之君臣間的權力分配。「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活生生是一幅君賞臣樂的景象。然而，「二三子以為己力，貪天之功」無疑是被排擠在權力滋味邊緣下的另一「怨言」者；「隱」與「不隱」，似乎端視封賞得著已否。猶有他輩，更不斷引頸翹盼，而以「文顯」等待封賞。⁴循此思路，從亡人士之封賞

3 《春秋左傳正義》（台北：藝文書局，1973年5月景印清嘉慶20年《重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堪記》），頁255。

4 《說苑·復恩》云：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返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趙善治：《說苑疏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頁134。可見陶叔狐在晉文公三賞後，仍不放棄機會。以「文顯」告於咎犯請文公行賞，這也顯示，的確在整個封賞過程，有人樂，有人悲；有人祿及、有人祿不及之。文中更可看見晉文公對從亡之士的賞功，有其高下名次之序，而依據的是能使文公「使我為成人者為上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為次賞；免我於患難之中又為之次、三行賞後為勞苦之士」的序列。以陶叔狐之士的身分，而又不在于前三賞，文公最後的封賞大蓋應是無功勞而有苦勞的從亡之士。《晉語四》也云：「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者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吳）韋昭：《國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排印清士禮居叢書本），頁132-133）

判然已分。論功行賞，別人皆有，亦吾獨無？造成這樣的局面，介之推所言顯然不是無的放矢。既言不言祿，祿亦弗及，如介之推者，是對權力的羞澀嗎？是對人間煙火的不食而讓賞嗎？反之，言祿而祿及的從亡人士，其人間煙火比較強烈嗎？堂而皇之而理所當然言祿嗎？甚至是在封賞中彼此不遑多讓？面對權力，以人之常情來說，鮮有退卻之理！介之推的隱與二三子的顯，都可放在一個從亡者與文公流亡的行動史景來觀察。

二、從亡人員

在我們檢視古籍陳述晉文公的出奔從亡人士的名單，首先觀測的基點必須由《左傳·僖公四年》公子重耳出奔流亡的第一幕史景開始：

晉獻公欲以嬖姬為夫人，卜之，不吉……弗聽，立之。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於公……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公。……姬曰：「賊由大子。」太子奔新城……姬遂譖二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⁵

豎頭須舌尖嘴利，但卻說中文公要害。不過，由豎言可以知道跟文公從亡之羈縻之僕，所謂拉馬、拉狗之車夫、僕役頗多，這些羈縻從僕，也許就是勞苦之士，所謂苦勞者。以文公為晉室公子，出奔自然應有起碼的排場，其中伺候的勞僕更是不可或缺，如果沒有豎頭須這傢伙吃裏扒外，竊藏以逃，重耳也許就能少吃一點苦，起碼不會淪落到被野人羞辱。隨身的會計竟然捲款而去，文公在身無分文下，必然捉襟見肘，顛沛流離而飽受餐風露宿之苦。（關於陶叔狐正文將有所再述，此不贅言）

- 5 《左傳春秋正義》，頁 204。在此文杜預注：「二子時在朝……」。《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記載：「……嬖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左傳春秋正義》，頁 177。）《國語·晉語一》的記載史景：「獻公伐嬖戎，獲嬖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嬖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以徹無辱之故。公許之。」（《國語》，頁 92-93）《國語》與《左傳》皆述及嬖姬之剷除三公子之計謀。《史記·晉世家》則云：「……十二年嬖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1982 再版），頁 623），顯然《史記》的說法，三公子主曲沃、蒲、屈乃是獻公懼焉，似乎與嬖姬之計無涉。然，細察獻公、嬖姬之言，其中因果脈絡，頗堪玩味。劉師文強在其〈未竟其志的伯者——論晉獻公〉、〈伯者的先驅——晉惠公述論〉、〈論「被盧之蒐」〉，載《晉國伯業研究》（台北：學生書局，2004），頁 193-298

僖公四年公子重耳因嬖姬所譖，因而出奔蒲城。然對重耳出奔之隨臣並未提及。在《左傳·僖公五年》又述奔翟：

晉侯使士蔦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讎也。」踰垣而逃，披斬期祛，遂出奔翟。⁶

這年《左傳》也未述說從蒲城而隨文公奔翟（狄）的從臣是誰。倒是《國語·晉語二》提供一些訊息：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夫狄近晉而不通……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狄。⁷

奔狄的分析，狐偃為重耳擘畫了出亡最佳的地點；既能觀察晉國情勢的變化，又能監視諸侯的一舉一動。審時度勢，狐偃是從亡之士首述者。《晉語二》又云：

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鉞。」重耳告舅犯曰：「里克

與 361-392，有精譬獨到的慧解與思路，言學者之所未言、不敢言。全文重構晉獻公、晉惠公、晉文公在整個春秋歷史的君者圖象。其架構的問題脈絡漂亮、論述清楚，廓清了《左傳》王公深寡有無的歷史道德迷霧。春秋君位權力之握奪，驚心動魄，骨肉父子兄弟夫婦力之所及，蕩然無存。一幕幕爾虞我詐、權力傾軋的鬥爭場景躍於歷史舞台，而赤裸裸地上演。晉獻公、嬖姬、太子申生、晉室公族、諸國伯主、晉惠公以至晉文公爭大位的多方角力，為政治權勢的巧奪與心思計謀的歷史圖景，更是令人嘆為觀止、拍案驚奇。劉師文強的晉室宮廷伯業與權力鬥爭的秘辛論述，運用了《左傳》、《國語》與《史記》的原典史料與先哲的疏注詮釋視景，過濾與釐析問題的脈絡與糾纏，開闢了一條史學推導論題的新路向。而關於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屈，近人楊伯峻言述：「《晉語四》載僖負羈之言，謂晉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在僖之四年，則重耳、夷吾此時俱年幼小，所謂主，所謂居，未必親自治理軍民，不過使其居守，另有師相輔佐之耳。顧棟高以此為疑，殊可不必。」楊說善，其能觀照整個三公子出亡之前後動態。（《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再版），頁240）。

6 《春秋左傳正義》，頁206-207。

7 《國語》，頁104。

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為。」⁸

《晉語》此述重耳奔翟的參謀乃是舅犯。重耳見使者來告請入晉室，的確有點心動，其舅父子犯（狐偃）從中沙盤推演利害分析，一語驚醒夢中人，想那里克在晉國的強大勢力，此去無非引君入甕。公子重耳屢次受教舅犯，可見狐偃當為從亡者第一把交椅。在《晉語二》又述及舅犯：

秦穆公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大夫子明狄，曰：「……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父死，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於。⁹

狐偃滿腔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重耳只能全盤聽從。仁信當頭，只好再拜不稽首，以成置德之氣象。¹⁰《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惠公卒，而晉懷公恐懼重耳在外勢力，下令公族不准跟隨逃亡在外的公子重耳，並限時回國，逾期者處死：

8 《國語》，頁 107-108。

9 《國語》，頁 109-110。

10 《晉語三》云：「……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被其外賂，彼塞我施，若無天乎？若有天，吾必勝之。』……」。昔日穆公欲擇二公子入晉，派遣公子繫往見重耳、夷吾。重耳再拜不稽首，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于利也。……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為惠公。」（《國語》，頁 116-117。）公子繫雖直言重耳仁，但是口惠而實不惠，心裏打著文公的如意算盤，文公自然了解。只是，豎頭須捲款而逃，身無分文，無法給予公子繫見面禮；以利字擺中間的思考模式，穆公亦同。試想，公子繫哪是「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沒有收穫，對重耳自然輕描淡寫，為重耳擦上置仁的面粉，也為自己的知微補妝。更甚者，莫如秦穆公，明明是為自己利益著想，卻還追悔未置有「仁孝」的重耳，在韓原一戰險些被俘，責備晉惠公殺內主、背外賂？站在利益權力線上，卻還想仁義氣象，穆公似乎也該自我反省吧！

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對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乃殺之。¹¹

狐突代表晉國貴族勢力，¹²對晉懷公可說是最大的夢魘。其祖父晉獻公，其父晉惠公莫不以對抗剷除公室勢力為職志，甚至隨時籠罩在君位政權的不保陰影下，懷公對狐突的逼迫與殺戮顯然可以理解。尤其當其二子（狐偃、狐毛）投效在公子重耳的帳下，如果來個裡應外合，懷公豈不是坐以待斃！剷除狐突，正是切斷重耳的內線。在此，狐毛與狐偃可說是最早從文公流亡的人士。《史記·晉世家》在重耳奔狄前後的述景是：

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翟。……晉惠公十四年卒，大子圉立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¹³

司馬遷書寫重耳前後奔蒲奔翟，都未提及從亡之士。然而在晉惠公卒，懷公繼位

11 《春秋左傳正義》，頁 250。

12 《左傳·僖公十年》載：晉侯改葬公大子。秋，狐突適下國。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君曰：「諾！吾將復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于韓。」（《春秋左傳正義》，頁 221。）由此文看，狐突乃是申生的勢力集團的要員，杜預直飭《左傳》此文本事妖夢，假託上天。然而，我們印證《國語·晉語三》：「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公子重耳其入乎？』」明顯可以感受，當時晉國貴族公室的確與晉國國君有著權力利益之緊張衝突，晉惠公的確不見容于貴族舊勢力，得不到貴族的支持。狐突既是申生故御（《左傳·閔公二年》述：「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在《國語·晉語一》亦述：「太子遂行，狐突御戎……狐突嘆曰：以彤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雖勉之，狄可盡乎……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申生戰，果敗狄於稷桑而返，讒言四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也。」既是申生身旁諫臣，自然是晉國舊有貴族勢力的大柱，其對惠、懷二公自然有所敵意，只是表面上維持假象和諧的君臣關係。

13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註考證·卷三十九》（台北：洪氏出版社，1982年，2版），頁 21-37。

時，卻說重耳在秦，並言狐毛、狐偃二子隨重耳從亡之。不過，晉懷公子圍懼秦勢力襄助重耳，更畏己離秦之怨，固有宰殺狐突，以壓制國內貴族，誰知弄巧成拙，激怒秦穆（繆）公發兵，並隨送重耳返國，而身遭殺害。至於狐毛、狐偃的從亡事蹟，則是闕如。在此，文公之從亡人士只知有狐毛、¹⁴狐偃。而《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述及多位從亡人士：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城人欲戰，重耳不可。……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廡咎如，獲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文公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晉公子，姬出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

14 狐毛從文公亡狄，文公每事詢狐偃，而狐毛又為狐偃之兄，必有子嗣。《國語·晉語四》云：「……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可見狐毛從亡年齡應在文公之上。《左傳·僖公二十六年》云：「冬（文公二年），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春秋左傳正義》，頁 263。）以趙衰從亡文公之功，始封原邑大夫。狐毛之子狐溱（《春秋左傳正義》，頁 263，傳文之杜預注云）竟也能封溫大夫，必然是有功于文公。本文故此推想，狐溱亦是從亡人士之一。至於趙衰在狄，文公以叔隗妻，生趙盾。趙盾是否有跟著文公從亡他國（除狄之外，此時趙盾尚幼，年紀應比狐溱少很多歲。）？《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云：「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可見趙盾一直在狄地生長，文公反國居位，因逢狄人歸季隗，趙姬遂勸趙衰迎叔隗與趙盾。因此，趙盾應該沒有跟著文公從亡各國。

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¹⁵

《左傳》這段述景，是晉文公與其從亡者互動關係的最佳寫景。它出現了從文公奔狄的人士是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與司空季子。杜預與孔穎達的注、疏云：

衰，趙夙弟（子？）……魏武子：武子魏犢。……司空季子：胥臣、白季也。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從者肅，敬也……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¹⁶

胥氏也，臣名也。晉有白邑，蓋食采於白邑。字季子而為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不言狐毛、賈佗，而獨舉此五人者，賢而有大功故也。顛頡歸晉，尋即被戮，而為大功者，當為從亡之時有大功也。《晉語》稱公子長事賈佗，佗非不賢，蓋傳文意之所在，便即言之，未必五人皆賢於賈佗。……《晉語》云：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從之，可謂賢乎！宋公孫固言于襄公曰：「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僖負羈言有卿才，公孫固說其名氏，知是一物，故並引之……從者忠而能力：廣

15 《春秋左傳正義》，頁 250-253。

16 《春秋左傳正義》，頁 251-253。

而至能力。廣大者失於奢僭，故美其能儉也；文華者，失於傲慢，故美其能有禮也；能敬者，失於褊急，故美其能寬容也。忠誠者未必有力，故美其能勤也。此四者，每兩事相反，而美其能兼而有之……《晉語》說公子懼，降服而因此事云：「公子欲辭懷嬴，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而納幣且逆。」孔晁云：「歸懷嬴更以貴妾禮迎之也。」服虔云：「申意於楚子，伸於知己；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己。」¹⁷

杜、孔注與疏的重點分述兩項：（一）補充傳文言重耳奔狄從者五人加列狐毛與賈佗，五人之賢而有大功且行止敬肅，而狐偃、趙衰、賈佗三者為卿才，趙衰能通言，有文才。（二）顛頡歸晉不久被戮，¹⁸但在從亡亦有大功；而重耳流亡時

17 《春秋左傳正義》，頁 251-253。

18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云：「晉侯圍曹，門焉，多死……三月丙午，入曹……令無入僖負羸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僖負羸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顛頡被戮是在文公反國五年後伐曹以報共公窺浴觀裸駢脅之辱時。而孔穎達依杜預之語，謂顛頡從亡賢有大功。顛頡被戮，《左傳》的說法顯然與文公頒布無入僖負羸之宮，而且免其族。顛頡抗命，文公徇於師前而殺。然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卻云：「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於是遂興兵伐原……伐曹……」。（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72），頁 750-751。）《韓非子》的說法以文公立法為嚴，後期者行軍法；雖然顛頡為文公寵愛，但未申法言信，將遲到之顛頡以法腰斬。比較二文差異，顛頡之被殺，應是不守君令與軍法緣故。前段引文又述及舟之僑被文公任命為戎右，以接替受傷的魏犢。舟之僑事最早出現在〈閔公二年〉，傳云：「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及。殃將至矣。』遂奔晉。」舟之僑身為虢國大夫，不替虢公強諫，不思分君之憂；卻只在事後放馬後炮，甚至全族奔晉投靠。難道：「殃至」未到，就不能像宮之奇者再三勸諫虞公，即使做做樣子也可。哪能一句無德而祿、殃將至的批評就馬上閃人，全族奔晉投靠呢？《國語·晉語二》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召史嚚占之……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眾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國語》，頁 104-105）。此種說法，是識時務而奔之？亦是捨其臣道而逃？舟之僑當時奔晉為晉獻公十七年，舟之僑是否投於重耳門下，不得而知。其間歷經獻公、惠公、懷公乃至文公五年，才述舟之僑與文公攻曹。我們懷疑在文公居蒲或奔狄時，舟之僑是否是文公之從亡人士之一。換言之，舟之僑是否在從亡之二三子的名單中？《說苑·復恩》云：「晉文公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則可爵而爵之，則可

的顧問團分別是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者左右公子重耳的動向觀瞻，隨時為之請益。最驚爆的閨房內幕則是懷嬴為文公所辱、欲辭，懷嬴以曉之秦晉既匹，何以卑我的言論，最後文公聽從胥臣、狐偃、趙衰的建議以納幣、貴禮迎歸懷嬴。¹⁹杜預與孔穎達的說法，在極大的程度援引了《國語》的說法。傳文提及文公及鄭，鄭文公不禮，其臣叔詹諫說文公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杜預與孔穎達認為此三上從人是狐偃、趙衰與賈佗。《國語·晉語四》云：

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²⁰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

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瞿然曰：『子欲爵邪，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頌《甫田》之詩。」（《說苑疏證》，頁 139。）文中情節似乎與介之推在《史記·晉世家》雷同，只是分別是舟之僑與介之推。若不論是否《說苑》將事蹟弄混，將舟僑視為介推？最有可能是二人行事規格雷同（《說苑·復恩》篇章相繼出現介推與舟僑的事蹟，可顯是分記二人之事），因此有此說法？但據《左傳》所述，介之推身隱繇上而死，舟之僑卻為文公戎右。《說苑》的說法似乎與《左傳》牴觸。然而，舟之僑的從亡身分線索，或是久在晉國公室而未隨文公從亡，都有待進一步說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述：「晉侯圍曹……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春秋左傳正義》，頁 275-276。）文中說明舟之僑未隨大軍反國，中途不服軍令先行反國觸犯軍法，而遭文公明峻法以殺之。似乎舟之僑與顛頡者流下場雷同，都是不守軍令，擅自行動。文公申明法令，為服人心，只好斬殺。若非顛頡、舟之僑倚仗從亡之功，驕氣橫溢，而文公忍無可忍，為了展現「置德」君象與服民之心，只好在輿論壓力下殺此二人。舟之僑之由虢奔晉亦見《說苑·辨物》（《說苑疏證》，頁 549。）

19 孔穎達應是引韋昭注解《國語》的說法，並且引孔虔所謂以貴妾之禮迎之。孔氏說法見於《國語·晉語四》：「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嬴怒『何以卑我』，公子懼……秦伯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晉懷公）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可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何如？曰：『……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何如？對曰：『……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在此，我們可以見到胥臣、狐偃、趙衰三位從亡者對文公逆懷嬴妻之的見解。

20 《國語》，頁 125。

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啟之……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才……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君其圖之。」弗聽。²¹

顯然，晉文公在流亡歷程中也有其生活處理上的諮詢團，狐偃、趙衰、賈佗都位於名單之上。在《左傳·昭公十三年》記載韓宣子向叔向問明子干、棄疾孰能為君，叔向表述了其中原委，並以齊桓、晉文為分析，其中回顧了文公之從臣：

……我先君文公……，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²²

因此，我們可以更加確定從亡者的名單是狐毛、狐偃、趙衰、魏犢、顛頡、胥臣、賈佗、介之推。

我們再回到《史記·晉世家》司馬遷對晉文公出奔史景的一段記載：

晉文公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之舅（此六字，梁玉繩說是後人之注，錯入本文。）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二十二年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重耳至齊，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之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過鄭，鄭文公無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

21 《國語》，頁 125-126。

22 《春秋左傳正義》，頁 809。《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載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昭公十三年〉叔向所說有士五人，杜預與孔穎達皆云為前述五子。然而，叔向為何又將五人外再獨舉賈佗為股肱之臣，杜預與孔穎達說法皆云：「賈佗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

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重耳去之楚……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庸可殺乎？」……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夏，迎夫人於秦……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

23

《晉世家》之言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可見從亡人士也有數十人之多。以重耳堂堂晉室公子，出奔排場應切合其位爵而不至於寒酸。問題是，在所能查考行蹟動態者除上述從亡人士外，《晉世家》又載入先軫、介子推與壺叔。《會注考證》云：「據叔向言，先軫未嘗從亡，而史公併數之者，蓋偏就晉賢士屬意重耳者言之，不復問其行者與居者。」以此段考證回證《左傳·昭公十三年》叔向所言，似乎可以確定先軫為內主，當時為晉國國內之大宗貴族，未曾隨文公流亡。²⁴至於介子推當為位列從亡名單之中，毫無疑問。至於壺叔從亡的身影，似

23 《史記會注考證》，頁 629-633。

24 先軫（原軫）未隨文公流亡，依《左傳》所述，是可以確定的。在《僖公二十七年》（晉文公四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春秋左傳正義》，頁 267）這是晉文公反晉四年事，先軫才出現在傳文中，可見從亡之時，先軫未見

乎依稀彷彿。不過，在古典中可找到一些助證。《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述：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²⁵

對比《晉世家》所言：「不名者數十人」，以趙衰的從亡資歷尚有壺飧、徑、餒而弗食的經歷，其他數十人者亦必有之。如壺叔之從亡賤臣者，或如介之推之從者應該可信為從亡人士，只是他們的身分與從事比較卑微。然而不可否認他們的卑微貢獻。其實，此等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之苦勞者未被封賞不乏其人。《說苑·復恩》篇云：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實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數引我而請于賢人之門，無以為次賞……免我于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次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²⁶

《呂氏春秋·當賞》篇云：

絲毫事蹟行述，《史記會注考證》引梁玉繩說法可信。《晉語四》：「文公問帥于趙衰，對曰：『……』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如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國語》，頁136-137）。更可見文公反國面臨人事安排上的困境，尤其如卻縠、欒枝、先軫這些晉國舊有貴族勢力的抵制，文公在面臨從亡人士的自己人馬，與國內貴族勢力的兩派權力平衡，甚至是為使政局穩定，不得不使用「妥協性的策略」，我們可見到「被廬之蒐」的元帥權位安排，卻縠將中軍、狐毛將上軍、欒枝將下軍，卻縠、狐偃、先軫為佐，六名卿位，晉國舊貴族占四名，從亡人士只占兩名，而且狐氏兄弟本就是晉室貴族。在《韓非子·南面篇》之文：『管仲無更齊，郭偃無更晉，則桓、聞不霸矣』，晉國之所以伯，郭偃有否如《韓非子·南面篇》所說，其討論的空間頗大。尤其戰國時期三家之晉多法家，蓋有其可循線索。有關郭偃即是卜偃，其是否變法之說，世遠而義失，更須從各種史籍抽絲剝繭以還其歷史本目。不過在先軫將中軍帥的時代，誰能促使文公變法，誰能從這次變法中獲取最大的利益，答案應該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25 《春秋左傳正義》，頁264。

26 《說苑疏證》，頁134。

三出，而陶壺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注：陳其猷疑為唐圃，形近而訛。）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²⁷

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所云手足胼胝、面目黧黑之勞有功者：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氏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²⁸

就《史記》之賤臣壺叔、《說苑》陶叔狐面目黧黑之勞苦之士、《呂氏春秋》陶狐唐圃之勞徒與《韓非子》之面目黧黑、胼手胝足者為後，在晉文公流亡生涯中，少不了一批伺候、勞役、園匠工徒。此批從亡之徒皆是未得封賞的勞苦之士。雖然不是輔義導禮、彊賢舉過之有德勞心之人，然而勞力於餐風飲宿、摩頂放踵，亦有可述行蹟。下層之勞力與上層之勞心，都有其星月流轉、從亡壺食的身影。而這些從亡人士在文公流落天涯歲月中，各以何種的能力在詭譎多變的列國裡周旋，進而造就了文公的權力政權，成為文公最堅強的禁衛軍，此中氣象不可略過，請言從亡人士。

三、從亡人士動態

晉文功的伯業所以奠定，在一定的程度上，其身邊的從亡之士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沒有這批從臣的長期調教與衝鋒陷陣，晉文公是很難飛上枝頭成就伯主氣候的。尤其在面對晉國舊有貴族勢力的抗衡與囂張爭權的氣焰，文公能夠

27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頁 1610。

28 《韓非子集釋》，頁 644-645。

成功反國繼承擺平暗潮洶湧的權力分配，這批從亡人士的力挺與呈現出的治(智)略，才是文公政治生涯走向巔峰的主因。清朝研究《左傳》的著名學者顧棟高，對文公的核心從臣，提出他的觀感：

從古一國之興，莫不有股肱宣力之臣，後利而先義，推賢而讓能。蓋自唐、虞之士，禹、皋、稷、契、交讓一堂。下逮春秋，伯者之佐，亦莫不稟此意以周旋。無後世草昧初起，飲酒爭功，拔劍擊柱之態。于此益知先王禮義之教，去人未遠也。余觀晉狐偃、趙衰、胥臣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從公子于外十九年。幸得返國，即使其才庸下，亦當居首功，況三人皆天下才。而當作中軍、謀元帥之時，趙衰薦卻縠，又讓欒枝、先軫。狐偃讓于狐毛，而已佐之。猶曰「此其同列兄弟也。」逮狐毛死，先軫子且居為上將軍，而狐偃佐之，先軫死，子且居嗣為中軍將。夫狐、趙于先且居為丈人行，而先軫未嘗有從亡之功，乃父子並將中軍、上軍兩世，而狐、趙為之佐。先氏偃然列其上而不疑，狐、趙泰然處其下而不忌。相與出奇效策，戮力同心，此豈文公之德有以致之？殆亦氣運使然，天生此三人以昌晉之伯也。……余觀人臣功名之會，莫不敗乎爭而成于讓。……若三人者，豈特天分過人？蓋亦沐于先王禮義之教，浸淫而不自知。觀趙衰之薦卻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胥臣之舉卻缺，曰：「敬，德之聚。」而子犯詔公子不以得國為利，至蹈九死而不悔。非有得于聖賢之教而能然乎？……²⁹

顧棟高月旦狐偃、趙衰、胥臣三人之行誼千古傳誦，蓋亦沐于先王禮義之教。從他的論述，似乎可以切割成二個史景。第一場景是從亡文公十九年，出萬死不顧一生。第二場景是反國得賜軍權，不爭成讓，雖終其一生未得坐上中軍帥之位，但是處泰然而不忌，佐先軫、先且居出奇效策，輔文公仁親之訓，以圖晉國功業。姑不論顧棟高謙讓見解有何疑處？沐于先王禮義之教的視野是否過於矯情，而有失史實？³⁰在我們會合這兩個場，此批從亡之士外可攻，內可守，確實助成文公

29 顧棟高：〈晉狐偃、趙衰、胥臣論〉，《春秋大事表》（台北：廣學社印書館 1975.9），頁 3134-3137。

30 趙衰的謙讓，似乎起了關鍵之鑰，謙卑柔性的低姿態調和了文公與舊有貴族的矛盾。先居下位，並勸文公採取妥協低姿態。直到文公四年以後，在貴族無異議下，讓趙衰將新上軍，正

伯業。我們願意從顧棟高提供的史景，進入歷史材料中來檢視從亡之士的時代動態，以避免傳奇、戲說所造成對歷史曲釋的飄忽幻象。

(一) 狐偃與狐毛：

就從士的身分背景來說，狐偃、³¹狐毛是重耳舅父，亦是晉國貴族勢力之大宗。在《國語·晉語四》有如下說明：

元年春，……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姓。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卻、柏、先、

式為卿。趙衰之謙讓的用心是有價值的。為何趙衰能得文公寵愛？身分與忠誠是主因，姻親與文辭善是助因，更是善于審時觀勢。提議卻縠為中軍將，一則非從亡之士，一則能得舊有貴族人心，一則更能令文公安心。趙衰能理解文公謀元帥的『慮難』。事關自己政權的穩定，豈可兒戲。然細思趙衰言意，由趙衰提出的人選的確能平衡從亡者與舊有貴族勢力二派系的權頃。卻縠溫和，優點又不致構成對文公的威脅，又能堵住貴族們的嘴。其他從亡人士當然眼睛放亮，雖想力爭上游，但礙於時勢，只好克制。卻縠既然能力平平，又是貴族身分，其人之中立性較高，於是中軍帥一職便為雙方在彼此妥協下的唯一方案。顧棟高以功臣為爭而不讓，飲酒爭功，拔劍擊柱；植黨樹權，營私報復，此種人臣功名之會，莫不敗於爭。唯有沐先王禮義之教而成于讓，方為股肱宣力之良臣。本文以為政治現實，乃是一種權力分贓與妥協的藝術。敬德仁親成讓無非陳義過高，其中狐偃、胥臣、趙衰之時代動態有其曲折變化，應有一理路脈動可尋。若于皆『能沐于禮義之教』而述狐偃、趙衰、胥臣之謙讓行德，實有商榷之議。此三人以昌晉之伯，其謙讓之用心，又豈能以仁親之訓視焉？查之狐偃「沉璧以質，河伯共之」的舉止，狐偃真有沐先王禮義之教乎？文公之作三軍、謀元帥之史實意義豈能被淹沒哉？

- 31 劉師文強對於子犯（狐偃）的論述有些陳詞不甚令人懂。劉師在論〈被廬之蒐〉（頁 373-374）引述《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又引《晉語四》：「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沉璧以質。」劉師於正文云：「從亡者如子犯這種行徑，根本是在威脅。介之推批評那些從亡之士『貪天功以為己力』，並非空穴來風，至於晉文公也不知節制的賞，『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這樣必然侵害到舊有貴族的權益，引起舊有貴族極度不滿與恐懼……」。我們看《國語·晉語八》趙文子稱賢隨武子云：「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可見狐偃整體「善謀」的表現與趙衰、胥臣等從亡人士相比，其對權力的渴望與機心是比較強烈的。

羊舌、董、韓，寔長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阜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汜。使來告難，亦使告於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啟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
32

此文述及文公返國，開始其政治布局與經濟、百工、教化政策，上下邑封，一切有司。其中更透露出許多封賞線索與人事職位的牽動，尤其晉室貴族一一詳列。其與介之推不言祿文正可交互參照，比對其中原委，從此論功布政、百官明賢的氣象中，提供我們論題解碼的強大資訊。首先，胥、籍、狐、郤、先、羊舌等公族是賞賜的大贏家，文公回國面對舊時貴族的強大勢力，要在流亡從臣與貴族舊勢間如何取得權力的平衡，對文公確實是一大考驗。狐偃與狐毛如何在「作三軍」中脫穎而出，與晉室舊有貴族並列六卿，這其中的權力運作與互動，實是牽動從亡人士與晉國國內舊有貴族勢力兩派系之間的人事權競逐。晉文公長久與從亡人士建立起來的革命感情，在此攸關未來權力生涯的緊要時刻，如何發揮影響力，值得觀察。尤其，從亡人士的身分背景與能力動態更左右未來文公的政局發展路線。

同時在出奔從者中，的確存在著親疏與身分遠近尊卑的現象。我們更可以看到趙衰、³³魏犇（畢萬為其祖父）、賈佗、顛頡雖是羈旅之臣，³⁴顯然身分沒有狐

32 《國語》，頁 133-134。

33 《左傳·閔公元年》載：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頁 188），在此我們有必要說明與了解趙衰、魏犇這些從臣與趙夙、畢萬的關係。《春秋左傳正義》（頁 188）杜預注、孔穎達疏云：「注云：夙，趙衰兄，畢萬魏犇祖父。疏云：《史記·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趙衰。《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從《晉語》、《世本》」

34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春秋左傳正義》，頁 253），在《說苑·善說篇》（《說苑疏證》，頁 321-322）也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楚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眾，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不賢也。』」此中說明時人認為趙衰賢於咎犯，在政治手腕比咎犯靈活。甚至，趙衰最得寵於文公，因而由文公前紅人趙衰推薦陽楚父當然短日而成

氏兄弟顯赫。狐氏兄弟在整體從亡人士中，非僅是貴族身分的因素而出線上軍帥、上軍佐；更因其護駕有功，一路走來，指點文公迷津。狐偃、狐毛為日後文公之股肱大臣，有其從亡至入晉的因委。本段先言狐偃，再略述狐毛。

(甲) 狐偃：

《國語·晉語二》云：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夫狄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狄。³⁵

狐偃為文公近臣，為謀遠略，必審時勢。狄為狐氏母國，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而易達。不通、多怨、休憂于狄、觀晉國、監諸侯，狐偃為文公規劃了一個復國的最大潛修與蓄積能量的地點。經過十一年，居狄的階段任務已完成，返國的時機也來到。《晉語四》又說：

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無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歿矣，多讒在

仕。在晉文公流亡十九年中，趙衰一直是文公的文膽與心腹。《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載：「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與前引《說苑·善說》趙衰之智，這種種的跡象也顯示出趙衰與晉文公革命感情之深厚。就算是舅父子犯，在晉文公心中的份量，可能都要略遜趙衰一籌。晉文公對趙衰的喜愛更可在「文公奔狄，狄人獲二女納諸公子，重耳將其中之姝叔隗賞賜給趙衰為妻，可見其革命感情之密切。」同時，一個饒有趣味的跡象顯示，晉國國君對公族勢力的氣焰一直耿耿於懷，甚至要削之而後快。晉獻公、晉文公用人唯才。以晉獻公來看，不論是士為、趙夙、畢萬都是外來人士，不是晉國國君的親戚，他們受到晉獻公的重用，都是為了與晉國舊有貴族勢力抗衡。而且此等人士皆是能力強又謹守分際，忠心有能力。晉文公雖然無乃父之風，甚至回國內政局仍是舊有貴族在把持，要大量引進外來人士來制衡晉國公室，只能倚靠如趙衰等，這種晉國國君所謂：「對晉國公室貴族的恐懼症」的夢魘，是文公無法也無能擺脫的宿命。趙衰（趙夙之弟）雖然後來成為文公要角，但是也僅能去做到平衡晉國貴族的情緒，至於積極面地防堵貴族勢力的囂張氣焰，則是無能無力。此所以形勢比人強，文公最後唯有採取妥協策略，以換取君位的穩定。

35 《國語》，頁 104。

側。謀而無正，哀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饜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³⁶

狐偃十年生聚教訓的策略已經奏效，接下來要放眼天下的格局。當今諸侯的伯主還是齊桓公，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狐偃的打的政治算盤很精準，攏絡齊國以為重耳返國鋪路。所以在離狄前，為文公做一番列國局勢的沙盤推演。此後在列國流亡中，晉文公的應對進退，狐偃更是鞠躬盡瘁，苦心調教。《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³⁷

《晉語四》：

乃行，過五鹿，乞食于野人……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³⁸

重耳生聚離狄後，遊列國、說國君，準備返國的大業。無奈，之前隨身的守藏官豎頭須須捲款潛逃，害得文公身無分文，手頭日絀，一行人經過五鹿，因無食糧而向野人乞討，卻換來一頓羞辱。文公弗忍亦鞭，幸賴狐偃曉以大義，勸以忍辱負重，以大局為是。並以申之明志，稽首而拜，載土一路及齊：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姜氏謂公子：「子有四方之志……」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³⁹

36 《國語》，頁 121。

37 《春秋左傳正義》，頁 251。

38 《國語》，頁 121-122。

39 《春秋左傳正義》，頁 251。

《晉語四》：

齊侯妻之，甚善焉。……將死于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言于公子：「……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公子曰：「吾不動矣。」姜曰：「……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遂行。⁴⁰

《晉世家》：

至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馬二十乘，重耳安之。桓公卒，齊內亂，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返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乃與趙衰謀醉重耳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父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⁴¹

重耳這一路奔亡諸國，餐風露宿、行色匆匆，日子當然沒有在狄舒服。如今，桓公厚馬乘二十匹，外加齊姜妻之。無怪文公樂不思蜀，懷與安之，怎麼會想四方之志？連齊女都懂得經略大國，分析齊國狀況，苦口婆心的說：「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無奈，文公心意如鐵，必死於此。舅犯與趙衰等勞臣來軟的不行，只能來硬的，謀醉而行載之。半途文公覺醒，竟然怒不可消，欲戈逐、將食肉子犯。若非子犯、趙衰從臣苦心謀劃，文公半途而廢，伯業可以成乎？子犯之謀正突顯文公意志之軟弱，然而，子犯豈能縱寵重耳？為圖晉室伯

40 《國語》，頁 122-123。

41 《史記會注考證》，頁 630。

業，必驅眼前小利；欲成就大事，就必須教導文公順勢而行。所謂：「小不忍離，則亂大謀」，步步為營；驅車他國，在所不辭。

狐偃以舅父之尊，愛之深、思之切。而文公從臣個個衷心護主，期待有朝一天反晉名顯：

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及鄭，叔詹薦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君其禮焉……」……及楚，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天將興之，誰能廢之？」⁴²

列國人士在觀察文公從亡者的動態，一致的公因數無乃足以相國、三士上人、肅寬而忠有能力。這麼強的輔佐陣容，連旁人都知，文公難道不知肩頭上的重任嗎？在宋室公親公孫固的話語，更可看出子犯、趙衰、賈佗三士的長才：

公孫固言于襄公曰：「晉公子亡……，而好善不厭，父事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⁴³

狐偃可謂老謀深算，文公大小政事，悉問狐偃，所謂：「父事狐偃」，猶如項羽之事范增，尊為「亞父」亦不為過。⁴⁴在《晉語四》鄭叔詹更說：

42 《春秋左傳正義》，頁 251-252。

43 《國語》，頁 125。

44 《史記會注考證·項羽本紀》云：「……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項梁然其言……項梁死，沛公去外黃攻陳留，與沛公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項羽晨朝斬宋義頭，出令軍中……當是時，諸將皆懼服……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項王留沛公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集解》：『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范增數目項王……出召項莊以劍舞，擊沛公于坐殺之……』。（頁 147）

狐偃，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才，離違而得其所，久約而無釁。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⁴⁵

如鄭國叔詹對文公的論評，成為雋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釁，這種長大成人、而才華出眾，離禍去國而舉動得所，與久處窮困卻並無瑕疵的美德行誼，狐偃、趙衰可謂輔佐首功，而狐偃為舅，諸士之較長者，其深謀遠慮，工於心計，更是文公不可或缺啟蒙老師。當文公如楚，《晉語四》又云：

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啟之心！」既饗，楚成子問：「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晉、楚治兵，會于中原，避君三舍……」楚王曰：「……且晉公子敏而有文，三材侍之，天祚之矣，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以厚幣送公子入于秦。⁴⁶

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公子返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⁴⁷

楚國，南方之強國。楚成王以周禮九獻饗而厚待，這種上公的高規格接待，似乎也在證明楚國的國勢。重耳過列國的接待，似乎難以與此番成王饗宴相比。公子重耳也似乎被這種大場面所嚇到而想辭謝，狐偃當面制止，此舉為天啟成王之心，要文公鎮定入饗，然後見招拆招、隨機應變。果然，成王有所企圖，以機智問題考驗文公「何以回報」？當然，狐偃必然面授機宜，惹得子玉不爽，欲殺重耳，扣押子犯。成王是聰明人，不像子玉意氣用事，雖然一句「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來安慰自己，但是形勢比人強，文公的敏而有文、三材侍之，如果輕舉妄動，只會留人話柄，況且要打通與北方諸國的友好關係，此刻厚待重耳及從亡三

45 《國語》，頁 125。

46 《國語》，頁 126-127。

47 《晉世家》。（《史記會注考證》，頁 631。）

士，正可為楚國做免費的廣告，加上秦穆公在後虎視眈眈，召公子于楚。成王審時度勢地盤算一番，還是做下人情，厚幣以送公子于秦。而狐偃的機宜，成功地完成重耳依秦反晉的策略。

狐偃、趙衰、賈佗當然知道反晉的關鍵就在於秦穆公的態度。當年公子繫一番置德置服的假話，秦穆公豈能不解？為秦國打算當然是迎立賂地的夷吾，誰知惠公不守信，背賂秦之河外列城五地，又聽信虢射之言不輸秦饑，種種恩恩怨怨，惹得秦晉韓原之戰，雙方撕破臉，惠公被俘，終給河外五地以交換惠公回晉，雙邊關係才由緊張趨于和緩，甚至共同為周王室合作「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然其子懷公又掀起爭端，不告而亡歸。重耳在從臣狐偃、趙衰的輔助下進入秦地，利用懷公與穆公的衝突，穆公於是轉而支持重耳返國繼位。⁴⁸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謂子餘曰：「何如？」對曰：「將有請于人，必先有入焉。……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⁴⁹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公子懼……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⁵⁰

48 有關秦穆公前後欲立夷吾、重耳，及與惠公這段的恩怨情仇，算是給秦穆公一個教訓。事後穆公對重耳返國之算計，已有藝術性的技巧，殺內奸瑕甥、卻芮于河上，妻懷嬴等五女，並送衛士三千人護駕，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有關穆公與惠公的恩怨論述，劉師文強的〈伯者的先驅——晉惠公述論〉，載《晉國伯業研究》（頁 267-298）有極精采的解析。劉師的論述擘畫出一個秦晉交流史及立君的重要觀察。從晉惠公、晉文公之二子欲立孰誰的事端到立惠公、懷公、文公，秦穆公在此扮演晉國孰君的裁量選擇權。以當時齊桓公伯，卻由西方的諸侯來選擇晉國的君儲，可見，秦穆公實力的不容忽視與對周王室的影響力，這多角的外力競逐，其中原委更是值得深論。本文認為「秦晉之好」的互動模式，確實是一個饒富趣味且深藏探討的課題。以文公逆秦懷嬴，穆公送衛三千以平呂、卻內亂，子圍質秦穆公妻之懷嬴，甚至申生之姐穆姬嫁于穆公，在韓原之戰惠公被俘的率子欲焚、挺娘家晉室的強勢；甚至後來秦晉崤之戰，秦國將軍被俘文嬴的一席話，驅使襄公不得不放走孟明視等人，甚至穆嬴抱靈公哭於太廟，直逼趙宣子立長君。這種秦晉婚媾的關係，都足以彰顯此課題的秦晉國政歷史之脈動。

49 《國語·晉語四》，頁 127-128。

50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春秋左傳正義》，頁 252-253。）

晉太子子圉亡秦，秦怨之。聞公子在楚，乃召之。秦晉接境，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節、忘大醜乎？」⁵¹

秦、晉聯姻是政治因素考量下的產物，不足為奇。尤其穆公宗女懷嬴有膽識，雖然曾為子圉妻，而文公怒之。但是奉匱沃盥不卑不亢，相對於重耳之沉不住氣，進而心懼降服以求，可見懷嬴非等閑之女。在宗女中，文嬴與穆嬴亦有可書焉。日後襄公之放孟明視之崤戰俘虜，原軫聽而唾之，不免見識秦文嬴的影響力與謀略，而秦穆公有此宗女，足可傲之。在文公之懼懷嬴怒色，甚至想一走了之，幸虧狐偃、胥臣等從臣在旁勸導，曉以大義，在政治現實下結盟姻親，而以大局為重。文公要想順利登入晉國君榜，穆公這關是非受不可。

狐偃的老謀深算當然也是在自己的利益考量，否則賠上一生青春而無所獲，豈不冤枉？所以押重耳這塊寶，自然得小心翼翼、步步為營地將重耳送回晉國君位上。《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綫，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⁵²

《晉語四》：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沉璧以質。⁵³

《晉世家》：

51 《晉世家》（《史記會注考證》，頁 631。）

52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見《春秋左傳正義》，頁 253。

53 《國語》，頁 130。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返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⁵⁴

《說苑·復恩》云：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何也？……」對曰：「……所有執勞苦者而皆後之。臣聞國軍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⁵⁵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犯對曰：「……勞有功者而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撻楸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而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乃解左驂盟於河。⁵⁶

以上文本同時聚焦在狐偃與文公的「沉璧以質」、「返國所不與子犯共、敢不與舅氏同心？」，其中突顯出，同共生死，同共享樂的權力哲學。狐偃耗其一生青春從亡文公，無非日後名顯晉室。眼見權力即在當下，社稷江山的權力滋味即將來到。狐偃的權力焦躁，不僅要文公交心坦白，更要立盟對誓，把那失去的貴族尊寵要回來。十九年的革命情感，如今革命成功，封賞在望，豈能不要求文公立下字據，使眾從亡者為見證。權力讓人垂言涎，嚐勝利果實也要努力付出，如今只差臨門一腳，煮熟的鴨子豈能讓它飛走？一句「從君還軫、巡於天下十九年，怨

54 《史記會注考證》，頁 631。

55 《說苑疏證》，頁 135-136。

56 《韓非子集釋》，頁 644-645。

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此中語帶威脅與提醒，文公在狐偃長久的教誨薰陶豈能不知！雙方沉璧以質，上告于天，下視河伯，進而雙邊安心，得到保證。權力讓人有安全感，果不然哉！

然而，狐偃畢竟得到想要的權位，但也一直忠於職事，鞠躬盡瘁，為文公創建伯業。《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⁵⁷

《國語·晉語四》：

元年冬，襄王避昭叔之難，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公，啟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⁵⁸

《新序·善謀》：

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晉、于秦。……狐偃言于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南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戊午，晉侯朝王……開南陽之地，……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善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于帷幄，則功施于天下，狐偃之謂也。⁵⁹

從文公的霸業基礎奠定角度看，狐偃是其中貢獻之佼佼者。勤王之論、先王之業，狐偃千叮嚀萬囑咐，文公剛接君位，急待建功立業。勤周王、追先祖、通狄戎，

57 《春秋左傳正義》，頁 262-263。

58 《國語》，頁 133-134。

59 漢劉向撰、明程榮校：《新序十卷》（台北：世界書局，1988年，4版），頁 58-59。

這一連串的外交內政的突破，莫如「勤王」的策略。要求諸侯、闢封土、聯外友，都在最高的指導原則「勤王」下，方能奏功。這個準確的視野與善謀，的確是狐偃送給文公入晉後，開闢其政治生命的第一大賀禮。接下來的「被廬之蒐」、作三軍謀元帥，狐偃在此政局的布展與謀動，更有肇基之功。《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云：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使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晉侯始入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⁶⁰

《晉語四》云：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乎遂伯。⁶¹

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聞之：戰鬥，直為壯，曲為老。未報楚患而抗宋，我曲楚直……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眾欲止，子玉不肯，至於城濮，果戰，楚眾大敗。⁶²

60 《春秋左傳正義》，頁 267-268。

61 《國語》，頁 139。

62 《國語》，頁 135。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晉文公問于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徧為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偃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逆殺之，失所以為從公也。」……狐子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狐子對曰：「不避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罷宋圍，還已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從狐偃之謀……。⁶³

整個戰略佈置與軍帥安排前置作業，都在狐偃的謀動中一一成行。文公請戰，子犯論義、信、禮三教，等到民具而戰，克曹、逐楚，大勝城濮。狐偃的政教一體，替文公拔得了勝楚的頭籌。《韓非子》所言狐偃明法申信、信賞必罰的法家思想似乎言過。觀《晉語四》言：

文公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

晉饑，公問于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于君心，則美惡不踰，信于名，則上下不干；信于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⁶⁴

63 《韓非子集釋》，頁 750-751。

64 《國語》，頁 137-138 與 136。

劉師文強在其〈論被廬之蒐〉說：「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其中有兩項重大突破，而重點皆在代管制度的建立。第一是將軍事指揮權交由貴族代管，而且是交由非從亡之士的舊有貴族代管，這點表現在中軍帥的任用上最明顯，所以三軍帥首任乃由卻縠擔任。在此，劉師提出：「郭偃是文公重要助手。此人曾在晉國的政治革新中起過重要作用。我們認為，不論是為晉文公著想或是站在貴族立場出發，推動這樣龐大改革計畫的主要人物就是卜偃，是則文公「被廬之蒐」，即是郭偃變法之時。然晉國之所以伯，郭偃居功厥偉；而晉國後世君權不振，郭偃亦不得難辭其咎。戰國時，三晉之國多法家，蓋其來有自。」劉師指出「被廬之蒐」乃至後來文公稱伯業，背後推動與執行這項法令的應該是晉國貴族郭偃。觀上引《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的說法應當是可信。不過靈魂人物應該是先軫與郭偃等舊有貴族人物。試想在這次「被廬之蒐」的作三軍的中、上、下軍帥等將領中，貴族勢力有四，從亡人士只有狐偃、狐毛上榜，而且其兩人本就是貴族身分，通過舊有貴族的同意權高。顛頡《左傳》述及在伐曹時與魏犢不服文公指令，入僖負羈宮並蒸僖負羈，而遭文公明軍紀而殺，以徇師。總之，顛頡的被殺在文公被廬之蒐、作三軍後，其觸犯郭偃、箕鄭等之信賞必罰、申明軍信是不言而喻的。至於狐偃被《韓非子》錯入，大概是狐偃的貴族身分以及從亡到入晉輔佐文公都有他不可抹滅的身影與影響力在。在這一次的被廬之蒐、作三軍後，文公與貴族間的緊張關係可藉由人事的妥協協商得到穩定，但是自此君權的權限也漸漸消弱。狐偃于城濮一戰夾攻子西，挫楚左師潰，立下汗馬功勞，⁶⁵並在日後為文

65 《晉世家》云：「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嘆，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論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史記會注考證》，頁 635。）。可見狐偃城濮一戰勸文公勿忘從亡楚時之報言：「晉楚會于中原，晉兵退避三舍」，而得到文公更高的肯定。其實在城濮之戰前夕：「楚師被鄙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美美，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城濮之戰文公信心不足，夜而夢楚子伏己而盪其腦，陣前主帥懼，這是兵家大忌。文公信心力薄弱，幸賴狐偃來個精神喊話，拭去文公的夢魘，鼓戰而勝。文公一席

公與宋、魯、齊、陳、秦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與文公圍鄭以報從亡鄭文公之無禮。終其一生的貢獻，雖非堪稱功業彪炳，然而以文公之尊師事舅父，狐偃是成就文公伯業的開創第一臣，莫此為過。⁶⁶《呂氏春秋》云：

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叔代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文公聽之……定天子于成周，……遂伯諸侯……出亡十九年，反國四年而霸，此咎犯之謀也……⁶⁷

(乙) 狐毛、狐溱

狐毛雖沒其弟狐偃之出眾，但一路從亡重耳，緘默無語，然其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狐毛便有其可說處。《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贄，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⁶⁸

狐毛隨重耳奔狄應是事實，雖不列五士中，孔穎達認為獨書五人而不見賈佗、狐毛，乃是此五人者賢而有大功，故不言賈佗、狐毛。在《國語·晉語四》云：「公孫固言于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

「偃說我毋失信」雖是話頭，其實心裡面感激的是增強他的必勝心念。參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春秋正義》，頁 272。）

66 狐偃何時卒，《左傳》未有載錄，但在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文公六年〉傳云：「僖公三十一年，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五軍各有帥及佐共十卿，先軫、卻縠、先且居、狐偃……三十三年箕之役，先軫死；去年趙衰、胥臣、欒枝、先且居死。據文公八年傳：『晉侯將登箕鄭、先都』之文，則卻縠、狐偃、胥嬰亦先死矣。」（頁 544）由楊氏推斷，則狐偃當在文公五年趙衰、胥臣卒後到文公八年晉襄公蒐於夷之間而亡。

67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年，1 版、1995 年，3 刷），頁 918。

68 《水經注·涑水》云今按《竹書紀年》：「晉惠公十有四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于秦師，狐毛與先軫御秦……」（《水經注》：台北：世界書局，1988 年，4 版，頁 86。）顯然狐毛是與重耳為敵，此說法與傳異，根本就是錯誤。

似乎符合孔疏。《史記會注考證》在《晉世家第九》注云：「《左傳》言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叔向〈昭公十三年〉言先君文公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五人從公子在一時，而狐毛，賈佗或稍後，因而逸之耳……」，將各家說法與《左傳》傳文對比，狐毛、賈佗雖未列從亡五士中，但絕對是在從亡隊伍名單中。《晉語四》云：

文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⁶⁹

照狐突所言，狐毛為重耳之舅，奔狄時已隨重耳，而且年紀也頗長狐偃。而狐偃在作三軍謀元帥的卿位安排中，更以狐毛賢而又齒長，甚至不敢逾越作弟弟尊長的政治倫理。從亡人士一群流亡列國，各國的風評都極佳。《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的述文：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足以相國。鄭叔詹諫曰：「晉公子有三焉……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⁷⁰

《晉語四》：

齊姜曰：「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時不可失，忠不可棄……負羈言于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為賢矣，……」⁷¹

公孫固言于襄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晉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叔詹言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

69 《國語》，頁 136-137。

70 《春秋左傳正義》，頁 251-252。

71 《國語》，頁 122-124。

楚成王曰：「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曰而不諂，三材侍之，天祚之矣。……」
72

從各國對從亡者的評價上看，都是股肱棟樑之材。文公所以廣而儉，文而禮，在這群從亡者身上學到了許多立身處世的能力。而狐毛、狐偃是文公舅父，既請益狐偃，也必諮詢狐毛意見。所以，狐偃將上軍之職讓于狐毛，而文公亦無意見，當然是狐毛齒德而賢，且從亡有功。《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對狐毛的作戰能力有一段描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始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⁷³

狐毛善于作陣兵法，將前軍分為兩隊，樹立二面旌旗向後撤退，以設疑兵迷惑敵軍，而以狐偃的上軍分道前後夾擊楚軍左師。狐偃當初選擇翟國為重耳出奔之處，其觀地審時的能力，狐毛也許提供幾分意見。狐突讓二子從亡重耳，無非二子同心斷金，他日輔佐重耳返國繼位，以顯貴族身分。

狐毛長于狐偃，與趙衰輔助重耳，則其流亡期間必然攜家帶眷，其子狐溱亦必在從亡中。《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記載：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趙衰圍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⁷⁴

以趙衰之賢有大功，文以忠貞，姑且先封於原邑，狐溱隨文公從亡與圍原，亦有功賞，所以封于溫地。

（二）趙衰：

72 《春秋左傳正義》，頁 266-268。

73 《春秋左傳正義》，頁 273。

74 《春秋左傳正義》，頁 263-264。

以宋公孫固所言：「晉公子亡，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而惠以謀。趙衰其先君之戎趙夙之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如依公孫固識言，則狐、趙、賈為重耳之三員重要顧問，更是重耳出奔流亡的左右近臣。賈佗事蹟多不載，而趙衰與狐偃之出身背景又不同，能力互有高低，狐氏兄弟為文公之舅、晉室貴族；趙衰兄趙夙事獻公，趙氏非晉室公族，長久居在耿地，與晉國權力核心疏遠，又為羈旅之臣。趙衰的身分與狐偃自然為別，然而，晉室長久受貴族壟斷權力，獻公令士為盡殺桓、莊之公族，無非是公族長久的目中無人，且威脅到獻公的施政。重耳重用趙衰，亦可是秉先父之志，重用外臣以壓制內族公室。可是，重耳亡外，這些舊貴族或羈旅之臣當然不分彼此，以時間換取空間，儘量護送重耳反晉繼承君位。所以一路盡心調教重耳成為大器。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載：「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狐偃之動態如前所述，而趙衰之從亡角色與入晉面目更是與重耳政治生命的開展息息相關，不可不察。重耳從亡列國，各國諸侯、大夫之觀測從亡者的氣象不外「足以相國、三士足以上人、肅寬且忠而能力」，這是一般的共相。

趙衰與狐偃又有何分殊不同呢？《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云：

秦伯納女五人，……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⁷⁵

文以忠貞，果然是趙衰的招牌。狐偃自知文略於衰，所以在重要的正式外交宴禮中，要會賦詩是很重要的外交辭令，趙衰果然達於四方，幫忙重耳完成請命的工作，子餘號稱文公之「文膽」絲毫不為過。在《晉語四》記載的更為詳細：

秦伯將享公子，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乃使子餘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明日秦伯賦〈采芣〉，子餘使公子降

75 《左傳春秋正義》，頁 252-253。

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⁷⁶

趙衰果然有膽識文章，嫻熟《詩》義。與秦伯的賦詩互動中，不時地展現「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使主晉民，成封國，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使重耳降拜的柔性姿態，而贏得秦伯的稱譽與欣賞。沒有趙衰成功的外交辭令，重耳是無法過關的。此所以狐偃所言：「吾不如衰之文也」，成功地出擊還在勸說重耳要婚媾懷嬴：

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得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納幣，且逆之。⁷⁷

在秦表現，趙衰可謂可圈可點，使命必達，終於助成穆公送重耳返國繼位。《史記·晉世家》對趙衰的從亡動態：

桓公厚禮以宗女妻之，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謀行……謀醉重耳載以行。⁷⁸

秦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返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股之望時雨」……於是秦繆公與重耳歸晉。……⁷⁹

從亡返國後，趙衰的角色更是文公與晉室貴族勢力的潤滑劑，在趙衰的「文」

76 《國語》，頁 128-129。

77 《國語》，頁 128。

78 《史記會注考證》，頁 630。

79 《史記會注考證》，頁 631。

之特質下，文公之「被廬之蒐」、「作三軍」、「謀元帥」得以得到舊有貴族的同意，也為文公日後伯業奠定基礎。《左傳·僖公二十五年》云：

冬，晉侯圍原，……退一舍而原降……。趙衰為原大夫……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⁸⁰

表面上看，文公剛即位第二年，國內政局尚未穩定，尤其舊有貴族的反撲勢力，迫使文公先將原守之職安排給趙衰。一則安撫晉國貴族；一則讓趙衰處於外應地位。晉文公勤王之後取得南陽之地，以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暫時代管此封邑以便上繳國君食貢之職。文公之封趙衰原邑、狐溱溫地，正是這些從亡之士以食貢上繳國君，而補充了公田名存實亡的制度，因為這些公田國君已無法管轄，而公田也由主持人員直接向中軍帥負責。⁸¹換言之，在這一次的原邑、溫縣之封，正是提供文公生活所需的重要來源，公田已由貴族勢力所壟斷。此後，文公在作三軍謀元帥的行動中，讓趙衰再度挑起大樑。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⁸²

這段文公被廬之蒐的內情，《晉語四》有比較深入的說明：

80 《春秋左傳正義》，頁 263-264。

81 劉師文強〈論被廬之蒐〉提及：「晉惠公『作爰田』賞眾，有些貴族因此有數個封邑，但是他們必須與他人『爰田』，沒有絕對的統治權，所以在名義上這仍是屬於國君的公田。但是這些公田在某段期間內都歸貴族統治管理，而非晉國國君佔有，所以實質上也可以說是屬於貴族的田地了。貴族按照田地大小的比例出軍賦，因此雖有公田，都是交由貴族代管。文公封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這些大夫並非永久食此封邑，他們只是代管的人。該縣的收入必須上繳，這便是公食貢。自文公實行公食貢的制度，國軍所食皆貢自大夫，而非來自其所有已名存實亡的公田，國君也管轄不到主持公田的人員。」（《晉國伯業研究》，頁 379-380 下註解 60）。

82 《春秋左傳正義》，頁 267。

文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卻縠可。……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輔之。……公使原季（趙衰）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于臣……」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乃使趙衰佐上軍。⁸³

文公為何作三軍的始末原由，《左傳》與《國語》還是未說明清楚。此時，晉國國力已不容忽視，周王室更是明顯地想拉攏關係。因此晉國增加軍隊數目，本身已具實力條件。文公及位，東方齊國桓公已死，國勢衰微無法維繫原先伯業。而宋襄公欲起效尤齊桓公稱伯，卻被楚軍大敗於泓，整個中原面臨楚軍的強大壓勢。晉國在此時發揮蓄積的能量作三軍，可馬上與楚軍抗衡，這也是對抗楚軍北上，晉國作三軍的外在因緣。⁸⁴

而晉國本身的內在因素，則是文公藉由作三軍機會，安撫國內貴族，維持本身政局的穩定性。是時，晉國國內政局是舊有貴族勢力與文公從亡之時所培養的人士兩派之間的權力競爭。文公當然不願受貴族勢力擺佈，然也不能消除眼前的困境，唯一可使雙邊維持和諧、並向貴族示好的行動，便是啟動所謂的國安機制，消彌一些殘餘的頑抗分子，跟舊有貴族交換條件，同時安撫這些爭從亡功祿的人士。要由誰來作調人與說公道話，讓彼此雙方都能滿意呢？聰明的文公當然選擇「文以忠貞」的近臣——趙衰了。由他來主持大計，文公當然放心，以他是從亡人士中的羈旅之臣的身分，忠心耿耿一如士蒍，再加上他「文」的個性，與其他從亡人士的爭功衝動，可是和緩太多了。⁸⁵

83 《國語》，頁 136-137。

84 劉師文強的〈論被廬之蒐〉詳論文公作三軍的前因後果，尤其當時情境的列國國勢的消長變化與中原伯主的崛起，展現了這個論題的精密性與歷史必然性的邏輯推理。見《晉國伯業研究》，頁 371-382。

85 有關趙衰推舉的中軍帥人選，及其文公謀元帥的內情解析，在劉師文強的〈論晉國早其中軍

趙衰在文公授意下，挑起兩派勢力的平衡槓桿。卻穀雖是貴族勢力，但是才力平庸，所謂敦《詩》、《書》而說禮、樂的溫柔敦厚之士，其立場溫和、鴿派作風不致引起中軍帥太多的權力波動，是文公同意也是貴族接納的不二人選。上軍帥由從亡人士狐毛、狐偃擔任，以其是文公的舅父同時又是晉國貴族，文公與舊派貴族自然有所默契，一致通過。至於下軍帥人選當然是換取貴族更大合作的籌碼，由晉室公族欒枝與先軫接任。其中，文公處心積慮的想把自己人馬趙衰弄上卿位，這是明眼人都知道的事情。不過，趙衰秉持一貫「文以忠貞」的本色，一再退讓他人，其中或許害懼貴族的干涉，或許主持大計不便自肥自己。總之，先忍一忍，不要表態太早，果然日後當上新上軍帥。在這一波的人事協商中，很明顯的是文公的一種釋出善意與妥協性的做法，以換取貴族的勢力支持，為日後圖伯奠定一些資本；同時貴族得到事前規劃的權位，自然沒有任何異議。只是，僧多粥少，從亡人士中自然有些不平之鳴，礙於政治現實的考量，只得自我克制。不過，整體來說，就文公、舊有貴族、從亡人士而言，這是一次平靜的三贏收場。

然就趙衰之文與狐偃之謀互別苗頭，各有高下之姿。《說苑·善說》云：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三日趙衰而達。智不知其士眾，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不賢也。」⁸⁶

言下之意似乎狐偃妒才而不識智，趙衰愛才而識人。但更深一層涵義可見趙衰與文公之間的關係匪淺，以舅父子犯與趙衰在文公心中地位份量看，趙衰似乎是略勝狐偃一籌。最大的原因，大概是舅犯有強烈的「權力侵略性」，投璧以質的威脅陰影一直在文公腦中盤旋，隱隱作痛；相反地，趙衰羈旅之臣，處處退讓，做事又合文公心坎，守成而又不表態，沒有權力的侵略性，處理政事自然使文公大加放心。他之所以成為文公的心腹，左右日後晉國的政局發展，在作三軍的權位佈局正顯示他所以能成為文公身旁的靈魂人物的能力所在。⁸⁷

帥)《晉國伯業研究》，頁 467-476) 有一貫的視野來論述文公放心由趙衰主持推選中軍帥。

86 《說苑疏證》，頁 321-322。

87 關於對咎犯的負面批評出現在《晉語八》：「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以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

趙衰一生忠新耿耿，與其子趙盾相比，簡直判若二人。其佐文、襄二公卓然而有功勳，其舉薦陽處父，扶佐晉襄公，更是有為有守。文公五年趙衰卒，文公七年賈季評趙衰其人為「冬日之日」，可謂扼要中肯。而其忠貞有文，更贏得後世晉家子孫智武子之譽揚。《國語·晉語六》之載，可謂至矣：

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為文乎！⁸⁸

（三）其他：

（甲）司空季子（胥臣、臼季）

胥臣在《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云：「文公奔狄之從者五人」。但地位似乎是在狐偃、趙衰、賈佗之後。在從亡人士中的身分有三大類：一者具有貴族身分如狐毛、狐偃、狐溱、胥臣、賈佗等，其次為羈旅之士如趙衰、魏犢、顛頡、舟之僑等；再者為身分較卑微的士級身分如介之推、壺叔、陶叔狐等苦勞者。孔穎達疏云：「胥氏也，臣名也。晉有舊邑，蓋食采于臼邑。字季子而為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胥臣為晉室貴族而食采于臼邑。《晉語四》趙衰云：「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說明出胥臣的能力性向所在。然而，在整個文公流亡的歲月下，胥臣的動態又如何呢？《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云：「司空季子為從者」，在曹僖負羈妻云：「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在楚成王曰：「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這些從者的共相面都有關涉到胥臣的一面。《晉語四》云：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今子于子圍，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乃歸女兒納幣，且

焉。」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焉。其隨武子乎！納諫不望其飾，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趙文子善隨武子，非舅犯之仁義，可見舅犯的「投璧以質」的權力私利，是趙文子最為詬病的方面，而叔向似乎沒有表示意見。

88 《國語》，頁 148。

逆之。⁸⁹

一番親疏與利害的關係，要文公釋懷與子圉不過是過路人的關係，獲取他所遺棄的，不也可以嗎？說動了文公做了明確的決定。《晉世家》對重耳婚媾懷嬴的記載：

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⁹⁰

胥臣直言利害關係，眼光要放長遠，不拘小禮、結秦親以求入乃是當前的情勢，豈可因小禮而壞大局呢！重耳是聰明人，心裡面當然也在盤算何時才能重反晉國，實踐建國封侯的心志。《晉語四》載：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是二者，得國之卦也。」⁹¹

趙衰言胥臣多聞，可以佐之，的確證明胥臣在洞察時事的能力。卜筮之說乃是紙上作業，要封侯建國，經略天下，就必須先有晉國。釋卦之說可以從負面解讀，也可從正向解讀。要落實建國封侯就必須先得到晉國，有國土而又文德與武威具備，當然必成霸業。深通卦象之質的胥臣通過他疏通致遠的解說，要文公能以得到晉國為基礎，進而封侯，這裡顯現出胥臣多聞也多文的能力。《晉語四》又云：

文公學讀書于白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⁹²

89 《國語》，頁 127-128。

90 《史記會注考證》，頁 631。

91 《國語》，頁 129-130。

92 《國語》，頁 137。

廣聞博見，掌握盡可能多的知識，來等待能用的人，胥臣的論學之道在言意間透露了用人唯才的前提是要能虛心求取知識，活用知識而等待賢能之士。胥臣的諄諄教誨更在文公面臨作三軍謀元帥的人事考量事件中得到印證。《晉語四》云：

文公問于胥臣：「吾欲使陽楚父傅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不變，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楚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諮于二虢，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夫教者，因體能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⁹³

胥臣雖然告訴文公因人施任、因材施教的道理，所謂的：「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教誨之善事在因人，其實如何用四方之賢良以任政才是論說的重點。文公面臨謀元帥的人事考量問題，胥臣適時地以「文王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諮于二虢，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于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來教誨文公。所謂的詢、諮、謀、度、訪、諏都是文公在謀元帥下可以去考量的方向。換言之，元帥之謀雖有考慮的問題，但是如何平衡地處理，就須有因人施任的道理存在。如何在晉室貴族與從亡人士間取得分配的平衡與衝突利益的考量，解決之道還是在如何善用四方之良為前提。周文王之為政局安穩而多方詢問大老，進而任用四方賢良，無非是文公當前的一個參考方案。想必文公在胥臣論教誨謹之師事時，也會有所領略吧！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親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⁹⁴

93 《國語》，頁 138-139。

94 《左傳春秋正義》，頁 270。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於城濮。楚師背鄴而舍……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⁹⁵

文公「被廬之蒐」作三軍謀元帥的人事任免權在趙衰的安排折衝下，舊有貴族得到應有的要求，而從亡人士即使有所怨言，礙於現實只能忍氣吞聲，一致對楚。城濮之戰前，由於卻穀卒，整個軍帥軍佐作一個小幅度的調整，由原軫為下軍佐升任將中軍，而胥臣以佐下軍。這樣的人事安排，基本上還是由貴族取得行政操控權，原軫、胥臣都是貴族大宗，填補空缺自然是一種向舊勢貴族的妥協示好。而胥臣也適得其所，在城濮一役表現出色的軍事能力與技巧，用虎皮蒙住戰馬奇襲陳、蔡兩軍，陳、蔡軍潰而楚國的右軍接著潰敗。這是一次成功的戰術運用，兩軍潰退而狐毛再以旆旗假裝逃跑以誘引楚軍，城濮一戰終於取勝。胥臣不僅多聞而且有戰略。《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對胥臣的一段動態，更能看出他要文公不記前嫌，重用賢良：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⁹⁶

卻缺得到文公的諒解而為下軍大夫，在襄公伐狄之戰擄獲白狄子有功。胥臣向文公舉薦卻缺，且要文公不因卻芮曾經焚公室而仇怨，這是胥臣要晉文公善用四方賢良的再一次進勸。襄公即位，卻缺有功，而襄公亦不忘這是胥臣舉薦的功勞，

95 《左傳春秋正義》，頁 272-273。

96 《左傳春秋正義》，頁 291。

而把先茅的食邑賞給他。胥臣有此遠識，終能在晉國享其俸邑，也為晉國舉才賢良冀缺，留下胥臣舉冀缺而文公不避仇的政治佳談。⁹⁷

(乙) 賈佗：

賈佗的從亡動態，在史料中所述不多。《晉語四》有載：

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于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號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⁹⁸

透過公孫固言，賈佗是公族的身分，隨文公流亡時的任務是提供諮詢與教誨謙讓的養成教育的角色。《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杜預與孔穎達注疏為狐偃、趙衰與賈佗。在《晉語四》：「負羈言於曹伯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負羈觀察到的三卿之才，包括了狐偃、趙衰與賈佗。而所謂卿才、賢也可顯現出賈佗在重耳流亡時的輔佐重要性。《左傳·昭公十三年》：

韓宣子問於叔向……「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⁹⁹

依叔向的講法，從亡文公十九年，賈佗雖未如狐偃、趙衰之成為文公的心腹，但卻是文公的左右護法者，重要性不可忽視。賈佗與狐偃、狐毛、趙衰、魏犢相比，雖見載史籍闕如，但是賈佗始終是晉國國祚的支柱，活的時間都較上述從亡人士

97 有關臼季舉冀缺的記載，在《晉語五》（《國語》，頁 141。）有載述，其事與《左傳·三十三年》同。文公是否釋懷當日卻芮、呂甥焚公室的仇怨，表面上好像不計前嫌。然細思在舊有貴族勢力強大，卻、呂都是晉室公族，臼季舉薦冀缺背後是否有貴族的謀劃？而文公以下軍大夫任之，是否也在示好貴族，其中頗有可說之處！

98 《國語》，頁 125。

99 《春秋左傳正義》，頁 809。

要久，並成為襄公太師。《左傳·文公六年》載：

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且謂趙盾能，……事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100

（丙）魏犢、顛頡

魏犢與顛頡在從者五人的名單，賢而有大功。叔向說魏犢為文公股肱之臣，隨文公流亡十九年。文公反晉於被廬之蒐、作三軍的人事安排中，被任命為車右。官職很高而且為主帥護衛。依照當時文公謀元帥的人事安排，在貴族強大的勢力壓制下，從亡人士擠入軍、佐三軍才只有狐毛、狐偃，魏犢與荀林父被封為車右與御戎已受相當禮遇。但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圍曹時，魏犢與顛頡對職位封賞的不滿，激烈的表現在對文公命令的反彈：

晉侯圍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¹⁰¹

魏犢與顛頡從亡文公十九年，重耳返國封賞過程中也許如介之推所言「祿未弗及」？或是祿及而已認為弗及？換言之，即是對封賞的不滿意。所以，伐曹過程文公為報當年僖負羈饋盤飧，實璧的恩惠而下令軍隊無入僖負羈宮、免其族，更加激起魏犢與顛頡長久的怒怨，所謂的「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的強烈心聲。然而，形勢已非從亡時景，軍令與革命感情不能混為一談，晉文公為維持法令的聲威，雖是愛將也無能為力，殺顛頡以徇師，而魏犢雖未被處死，也由舟之僑來取

100 《春秋左傳正義》，頁 313。

101 《春秋左傳正義》，頁 270。

代車右的職位。《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述及顛頡被殺歷程：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何如足以戰民乎？」……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避親貴，法行所愛。」……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¹⁰²

顯然《韓非子》的說法是顛頡違反了軍令，為明法信而斬顛頡。這其中似乎也說明過去從亡的功勳不能成為今日法令的護身符，為強晉國，必須申法信賞。魏犢與顛頡的「勞之不圖」或許已成為有祿者極欲去之的「明日黃花」。

（丁）舟之僑：

《晉語二》云：「舟之僑在虢將亡前，以其族適晉」。《左傳·閔公二年》也云：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於渭汭。舟之僑曰：「無德無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說苑·復恩》云：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虢）而從焉。文公返國，則可爵而爵之，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舟之僑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者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邪，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遂歷階而去。……¹⁰³

102 《韓非子集釋》，頁 750-751。

103 《說苑疏證》，頁 139。

《說苑》所言非必真實。但《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其中值得思索者為舟之僑若無從亡之功，單憑其舉族遷晉，而獲文公封賞，實在沒有道理，況且是取代魏犢的職位。舟之僑是否從亡文公，正可從此「立舟之僑以為戎右」想起。

（戊）介之推、壺叔、陶叔狐等：

從亡者之封賞中，《左傳》為何書及介之推不及祿？不言祿？既是封賞從亡隨臣，想必介之推在晉文公流亡的歷程中，有其分擔君憂、解君之愁的貢獻？而如壺叔、陶叔狐等所謂賤臣卻也因封賞而出現在典籍記載中。換言之，要知介子推等苦勞者的動態，我們方可解出介之推何以祿亦弗及的謎團。《史記·晉世家》云：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者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功以為己力乎……母曰能如此乎，與女皆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尋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為介推田。……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其子。』晉人聞之皆說。」

104

介之推未及祿的原因，《史記》以為是周襄王以弟帶難急告晉，而文公是以賞從亡未至介推。介推從者為子推不平而懸書宮中，譏刺文公。整個封賞事件的來龍去脈似乎是在周王告難後而暫行封賞。但其中又有其隱因：二三子以為己力而貪

求天功。顯然介推的認知是被封賞者邀賞時的醜態，以及在這波封賞行動顯現無法令從亡者人人滿意，以致有像壺叔者流前來詢問為何未被封賞。〈晉世家〉前云：

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重耳曰：「若返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¹⁰⁵

有關典籍對介推的封賞記載頗多：《新序·節士》云：

晉文公反，酌士大夫酒，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深淵，得其安所，……」文公曰：「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然推亦無索于天下」……¹⁰⁶

《呂氏春秋·介立》：

晉文公返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此必介子推。」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¹⁰⁷

從各家說法可知，介之推對文公從亡之士的封賞感到失望，在自書明志後隱于縣

105 《史記會注考證》，頁 631。

106 《新序十卷》，頁 51-52。

107 陳奇猷：《呂氏春秋集釋》，頁 627-628。

山之中。而其從者，也許是所謂手足胼胝、面目黧黑之苦勞之流如壺叔、陶叔狐者，藉由封賞不祿而懸書宮門或發議論。其實，在整個封賞風波中，文公未必面面俱到，但是對於有功之從亡之士如狐偃、賈佗、胥臣、趙衰等則論功行賞未見闕漏。這或許在文公對壺叔所設定的一套行賞秩序中透露其賞封標準，而對於未及祿或祿弗及的從亡人士來說，有怨聲載道者甚至如顛頡、魏犢之「勞之不圖」者。

四、結論

晉文公一生政治生命的奮鬥史，與其從亡之士是彼此心手相連共同打拼出來的。忽略了這些從亡人士的動態，就無法了解晉文公稱伯的始末。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餐風露宿，歷經政治風霜、現實冷暖，在這些披星戴月的流亡生活，從亡人士的分擔君憂、解君之勞，功不可沒。而當文公入晉遭逢晉室舊有貴族勢力的頑抗，狐偃、趙衰、胥臣的謀略再度地輔佐文公在政局的安穩。趙衰在謀元帥事件上的沉著與分配，得到了從亡人士與晉國舊有貴族勢力的認同；狐偃的勤王策略奠定了文公日後稱伯的基礎。晉文公稱伯的艱辛與曲折，其政治生命的奠定與開創，這批隨著他東西奔走的從亡人士，應是最大的助因。忽略了從亡人士的動態，就無法掌握文公政治的圖象。對此，從亡人士焉能不察！

主要參考書目

- 《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徐復觀著，台北：學生書局，1991年，2刷
- 《水經注》，酈道元注，台北：世界書局，1988年，4版
- 《史記會註考證·卷三十九》，瀧川龜太郎著，台北：洪氏出版社，1982年2版
- 《左傳評》，王崑繩著，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8月，1版
- 《左傳微》，吳闈生著，台北：中華書局，1969年12月
- 《左傳會箋》，竹添光鴻著，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年，1版
- 《左傳導讀》，張高評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再版
- 《呂氏春秋校釋》，陳奇猷著，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
- 《春秋大事表》，顧棟高著，台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年9月
- 《春秋公羊傳注疏》，台北：藝文書局，1973年5月景印清嘉慶20年《重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 《春秋史論集》，張以仁著，台北：聯經事業，1990年
- 《春秋左傳正義》，台北：藝文書局，1973年5月景印清嘉慶20年《重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著，高雄：復文書局，1991年，2版
- 《春秋穀梁傳注疏》，台北：藝文書局，1973年5月景印清嘉慶20年《重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 《皇清經解春秋類彙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 《晉國伯業研究》，劉文強著，台北：學生書局，2004年
- 《商周制度考信》，王貴民著，台北：明文書局，1989年
- 《國語》（吳）韋昭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排印清士禮居叢書本
- 《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編印，台北：中央研究院，1994年6月
- 《清代學術論叢第三輯》，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11月
- 《清儒春秋彙解》，台北：鼎文書局，1972年4月，國學名著珍本彙刊

- 《新序》，(漢)劉向著，台北：世界書局，1988年4月，4版
- 《新序今註今譯》，盧元駿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1版
- 《新譯東萊左氏博議》，簡宗梧等註譯，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7月
- 《說苑校證》，向宗魯著，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7月，1版 1991年9月北京
2刷
- 《說苑疏證》，趙善治疏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 《韓非子集釋》，陳奇猷著，台北：世界書局，1972年

On Retinues beside Duke Weng of Jin's

Lin, Chung-Yang*

[Abstract]

Why can the Emperor—Duke W eng of Jin's (晉文公) territory be built? It was built on the influential retinues beside him. Without their long—term teachings and efforts—Duke W eng of Jin's couldn't be the emperor. Especially, he was exiled from the country for 19 years. Meanwhile he experienced great hardships. He was unwilling to be the emperor. Fortunately, the support and wisdom of the retinues light his will of fight. It made Duke Weng of Jin's political career come to the climax. If we ignore the roles of the retinues, we can't see clearly and understand his dominion. Therefore, we must notice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tinues.

Keywords : Duke Weng of Jin's (晉文公), Retinues (從亡人士), H u Y an (狐偃),
Zhao Cui (趙衰), X u Chen (胥臣)

* Part-Tim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heng Shi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